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文库

XIBEI DAXUE JINGJI GUANLI XUEYUAN BOSHI WENKU

THE MECHANISM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机制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分为数量型与质量型，两种机制均具有阶段性
与动态性的特征，金融体系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具体的制度背景与约束条件。

王 聪◎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陕西省优势学科理论经济学建设项目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文库

THE MECHANISM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机制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分为数量型与质量型，两种机制均具有阶段性
与动态性的特征，金融体系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具体的制度背景与约束条件。

王 聪◎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王聪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 - 7 - 5136 - 4629 - 1

I. ①金… II. ①王… III. ①金融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国②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①F832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5919 号

责任编辑 贺 静

责任印制 巢新强

封面设计 华子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2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

定 价 59.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5416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88386794

总 序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经济增长进入到了新的阶段。我国处于经济增长新阶段的表现：第一，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 年我国 GDP 总量全球排名第 15 位，然而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进程中，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 10% 左右，创造了“中国奇迹”。2011 年我国 GDP 为 471564 亿元，首次超过日本，2015 年 GDP 总量达到 676708 亿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我国在迈入经济新阶段后，面临着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根本任务。第二，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一直是低收入国家，1978 年我国人均 GDP 只有 226 美元，居全球倒数第 2 位。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人均 GDP 现已达到 5.2 万元，约合 8016 美元，排世界第 84 位。虽然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新的矛盾却日渐凸显，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新阶段的首要任务。第三，我国已经步入新型工业化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2014 年第三产业占总 GDP 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而且 PPI 连续三年下降，这意味着自 2015 年起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已经完全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目前我国已步入新型工业化国家行列。在质量型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将致力于发展新型工业化，与此同时面临着迎接世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艰巨任务。第四，经济增长的红利发生了变化。从 2011 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逐季下滑，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对外开放红利都在消退，投资驱动和需求拉动型的增长模式走到尽头，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了挑战，创造经济发展新红利空间的任务迫在眉睫。第五，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在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选择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以自然资源为依托,通过要素投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形成了“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机制。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资源禀赋约束作用加强,高投入的生产机制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效率低下,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数量下降且质量不足,人力资源效率低下,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影响了经济新一轮增长。因此,我国正面临着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任务,在这一转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推进我院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学院先后启动了“青年教师科研孵化项目”“教师学术沙龙”“青年教师国际化”,以及“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文库”等项目,以不断加强青年教师能力建设。“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文库”第一期已经完成,带动了年轻教师的积极性,带动了科研和教学活动,效果明显。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启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文库”第二期,入选的13个选题涵盖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科,具体包括李勇博士的《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长期经济增长》、郭晗博士的《结构变化与增长潜力: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及其结构转换路径研究》、王聪博士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李伟博士的《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王敏博士的《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增值贸易研究——理论与经验证据》、谢平博士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研究》、董建卫博士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位置对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石阳博士的《机构持股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影响研究》、谭乐博士的《基于情景的领导素质理论》和《环境不确定条件下领导者人格类型对领导有效性作用机制研究》、张洁博士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与提升方法研究》和《企业二元创新模式演进: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以及张宸璐博士的《组织柔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组织二元性视角》。第二期博士文库入选著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1. 突出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美国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可分为汲取性

和包容性两类，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特征包括保护产权、确保法治、市场公平竞争、国家向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和监管支持等，而汲取性经济制度则在这些方面存在缺失。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由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型。文库第二期中涉及制度与经济发展研究的著作有《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长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研究》。

2. 探讨在不确定性背景下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投资策略选择以及微观企业管理问题。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问题在现实经济管理中具有深刻的影响。在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不对称信息引发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热点。在宏观经济学研究层面，不确定性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需要在不同情景模式下开展。管理学研究中，由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管理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第二期文库中的《结构变化与增长潜力：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及其结构转换路径研究》《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位置对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机构持股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影响研究》以及《环境不确定条件下领导者人格类型对领导有效性作用机制研究》四个选题可归入这一研究领域。

3. 开放视角下的经济管理问题研究。2002年中国加入WTO，2015年人民币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国经济在各个层面都将面临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也将迎来新的挑战 and 战略选择。《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增值贸易研究——理论与经验证据》《企业二元创新模式演进：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和《组织柔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组织二元性视角》三个选题分别探讨了开放条件下的贸易和管理问题。

4. 企业管理的新问题与新思考。领导力研究和企业创新能力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策略，这也是近年来管理学领域要重点分析和探索的问题。当然，一个成熟的有创造力的企业不但需要构建以领导者为核心的组织架构，而且也需要不断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唯有此才能基业长青。我院工商管理学科团队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在领导力和企业创新研究领域形成的著作有《基于情景的领导素质理论》和《高新

技术企业创新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与提升方法研究》

入选第二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文库”的选题在突出不同学科研究特点的同时，也紧跟学术研究前沿，使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分析中国本土的经济和管理问题，这是学院近年来所倡导的大问题意识、追求“知行合一”与“顶天立地”的科研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文库”也是我院“211 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陕西省优势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保平

2016 年 10 月于西北大学

序 一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模式逐渐从由人口红利等形成的要素驱动转向由技术红利引领的创新驱动，这既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期也是瓶颈期，增长的动力源泉与特征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发展、创新与监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直接且重要。一方面，金融因素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距离在进一步缩短，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否则有可能对金融系统及实体企业融资造成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又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吸收和转移的能力，有效增加创新投入而有力地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深入探讨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历程，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从劳动、资本投入驱动型向知识创新的生产效率提高型演变。虽然一个经济体不能跨越自身发展阶段而随意选择经济增长方式，但可以通过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与知识创新加速其经济增长，从而推进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需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以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之际，需要首先准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以了解经济增长动力与主导力量的转换：

第一，随着与世界技术前沿差距的缩小，我国利用后发优势的空间越来越有限，需要更加勇于承担创新的风险与成本，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20世纪后期我国电话交换机的技术创新过程可以

看出^①：在发展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以政府为主导进行自上而下决策，将市场仅仅当作企业技术活动产出的接受者，企业既不对创新风险承担责任，也不会由于创新成功而增加收益，封闭式的“自力更生”的方针未能有效推动电信工业的发展，更不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以市场需求拉动，不仅提升了本国相关应用技术与技能（Know-how），还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研发和生产方面的差距。随着自主设计与制造能力的逐步提升，华为、中兴等企业的创新能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②。面对激烈的竞争，已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必须不断强化创新意识、优化创新过程、承担创新风险，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创新的实现途径呈现出多样性，创新驱动路径的选择需要结合自身实际与所处的外部环境。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共同构成了开放而有机融合的自主创新系统^③，推动一国实现核心技术、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存量的规模与经济环境决定着创新能否得到有效的扩散。而在技术的吸收和转移过程中，需要关注深层次的社会与制度的作用。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其主要目的是更有效率地将稀缺的储蓄资源配置到最有产出前景、有可能推动产品质量提高和生产率提升的智力或物质投资。因此，创新及其扩散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体系发展及其效率的影响。

第三，从创新驱动发展的来源看，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经费相对不足。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绝对值增长较快，从1990年的9.3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55亿元，净增约60倍，年均增长19.4%，增长速度远高于OECD国家；2014年又增加到613.5亿元。但是，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长期在5%上下徘徊，而美国是19.0%，英国是11.3%，日本是12.3%。基础研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即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均大于0.4%，西班牙

① ZHANG, W., IGEL, B. Managing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C Switch Industry as An Example of CoPS [J]. Technovation, 2001, 21 (6): 361-368.

② 张伟，杨选良，张宏涛. 20世纪后期我国电话交换机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07 (6): 1-8.

③ 张伟，杨选良. 自主创新概念的讨论与界定 [J]. 科学学研究, 2006, (6): 956-961.

牙、意大利等国均在0.2%以上，而中国还不到0.1%。更为严峻的是，我国研发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特别是基础研究经费结构存在缺陷^①。增加金融对于技术创新的有效投入，有助于政府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我在西北大学工作时指导的博士生王聪，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发表了数篇相关学术论文，并积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和教育部及其他省部级项目。她的勤勉好学与谦逊踏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聪博士在此书中将前沿技术差距概念引入经济增长中，并将其作为影响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机制与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这是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在研究中，王聪博士通过对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的比较，在新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内核基础上，构建了“数量型—质量型”作用机制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吸收与转移、基础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影响，据此剖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阶段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强调了制度背景与约束条件的变化对作用机制有效性的重要作用。区别于其他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线性关系的探讨，此书稿提出了金融发展作用机制的阶段性的假说，论证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抑制的存在有可能导致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出现，拓展并丰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方向，也是本书的重要创新点之一，有助于当前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对二者关系的深入理解。

值此研究成果付梓之际，衷心希望王聪博士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是以为序。

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张炜

2016年12月于西安

^① 张炜，吴建南，徐萌萌，阎波. 基础研究投入：政策缺陷与认识误区 [J]. 科研管理，2016, 37 (5): 87-93, 160.

序 二

次贷危机爆发近 10 年来，全球经济依然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卡尔多在 1961 年提出的著名的六个“典型化事实”，以及概括和总结的已有研究对 20 世纪经济增长得出的结论，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其中前五个事实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依次得到了解释。伴随着理论的发展，为了解释卡尔多所提出的第六个事实，关于各国增长率的显著的国别差异与长期增长现象，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与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摆脱规模收益递减规律，在动态一般均衡的概念框架下形成了阐述内生技术变迁与创新的分析工具，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与发展。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逐渐从早期的投资领域转向技术模仿、研发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等领域的研究。

资本积累与创新都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仅仅关注资本积累而忽视技术进步的缺陷，系统而完整地深入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创新，这些思想形成了我们理解并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内在机制与途径的基本的理论脉络。从宏观经济理论演变的历史来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或 AK 模型认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产品多样化模型与新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则更强调以科研形式出现的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金融发展在这些增长理论中往往处于相对“隐形”的地位，企业在投融资时有可能面临的融资约束困难，以及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在平滑创新投资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等很少被提及或被深入分析。Schumpeter (1912)，Gurley 和 Shaw (1955)，Goldsmith (1969) 和 McKinnon (1973) 是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先驱者，随后的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增进了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者

们争论的问题，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使金融发展，二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理论源头需要回到麦金农与肖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麦金龙和肖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先后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并指出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会抑制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经济如果得不到蓬勃发展则无法刺激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因此，他们主张实行金融深化，使实际利率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趋近于均衡利率水平，以使经济蓬勃发展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20世纪90年代，金和莱文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金融发展的初始差距决定了后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差异。由于发展中国家内源融资较为普遍，货币与实质资本是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提高实际利率有利于增加储蓄率，从而推动资本积累，由此，麦金农与肖赞同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两位学者思想的哲学基础均源于自由放任的思想，相信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麦金农与肖虽然开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体系，使得学者们关注金融发展中政府干预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却也忽视了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增加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失灵的概率。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意味着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真正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将不断加快。为了适应新常态的经济发展，中国正在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其特有的经济发展阶段与要素禀赋特征。综合比较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总量增长有余，但结构调整与效率提升却相对不足，金融抑制与金融市场分割依然存在；不少学者甚至认为，金融相关比率的持续上升正是金融受到抑制的直接表现。中国金融改革的具体实践，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矛盾与问题,虽然有总量性、周期性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结构性失衡问题。近日在北京举行的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为解决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健全要素市场,鼓励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会上所提出的“新方位”概念,是十八大以来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概念的融合。

为了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落实新方位理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的探究就显得必要与紧迫。在这种背景下,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聪博士的博士论文选题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又在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形成了本书稿。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想就本书的特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 在理论框架上,该书基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一个解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新框架。书稿提出金融发展的“数量型作用机制”与“质量型作用机制”,阐述两种作用机制的阶段性与动态性,提出了“理论解释—经验分析—路径选择”的逻辑框架,这个框架不仅验证了熊彼特范式经济增长理论关于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向技术前沿收敛的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厘清了具体的制度背景与约束条件对金融体系发展与相应政策选择的重要性。

(2)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以扎实的文献资料梳理、较为翔实的统计数据佐证论据,并突出了比较研究的思路。该书稿利用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相关统计资料数据,从制度与政策因素层面、金融中介层面、金融可得性层面等指标横向比较各国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进而以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1985—2015年面板数据及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较为先进的计量方法对金融—增长两变量间作用机制的理论假说与命题进行了验证,补充并丰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研究。

(3) 在现实应用性上,从“一带一路”与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以金融发展加速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书稿将理论框架拓展至中国“一带一路”与新型工业化建设

的新背景、新形势下，关注要素禀赋升级、空间结构优化、知识编码特征改变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能的约束条件与影响因素的变化，来特别考察以战略性、针对性地有序推进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冯友兰先生曾指出学术研究不仅要“照着说”，更要“接着说”，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新常态背景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更好地理解并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王聪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届基地班的优秀学生，本科毕业后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又在我院攻读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以后，坚持教书育人，教学效果好，得到了师生的好评。在学术研究方面，一直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为主题，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曾经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鼓励王聪进一步的研究，形成更多高质量的成果，是以为序。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保平

2016年12月于西安

前 言

金融体系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具体的制度背景与约束条件，其作用机制的有效性也不能脱离现实的金融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金融发展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其产生原因、作用机制与表现方式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在理论层面，熊彼特范式内生增长理论将创新的破坏作用模型化，通过把产品质量升级纳入分析框架，扩展了对持续技术进步的结构与制度决定因素的分析，从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借鉴熊彼特范式分析方法，基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阶段性与动态性的内在特征，本书将已有研究中的数量型、质量型作用机制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动态性相结合，提出金融发展作用机制的阶段性的假说：①在内涵与表现方式层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型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资本积累渠道动员储蓄，熨平禀赋冲击，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包括外延型资本积累与内涵型资本积累。而金融发展的质量型作用机制则表现为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与宏观效率提高推动经济增长：一是提高技术吸收能力以促进技术外溢效应与后发优势；二是推动 R&D 项目筛选、融资、过程监督等，以促进研究与开发；三是通过促进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影响技术进步主体的培育与形成。②在相关政策体制层面，数量型作用机制可以通过政府隐性信用担保达到促进资本短期内迅速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而质量型作用机制则更需要减少政府过度干预与适度放宽金融抑制政策，否则创新主体缺失、创新过程与创新成果转化等因素会阻碍金融发展通过技术进步渠道促进经济增长。

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统计资料数据，本书分别以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 1985—2015 年面板数据及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金融—增长关系与可能的作用机制及途径予

以实证检验。由于本书写作时间跨度较大,第四章、第五章正文部分指标区间分别为1985—2009年、1978—2007年,而2007年8月开始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增加了第四章附录1978—2015年跨国面板数据、第五章附录1978—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原假设进行显著性检验。一方面验证了熊彼特范式经济增长理论阐述的金融发展促进一国经济向技术前沿收敛的作用,另一方面验证了金融发展作用机制的阶段性的假说。

借鉴西方成熟理论的同时需要考虑本国的资源禀赋、技术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阶段等因素对模型中各变量的影响,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如此。中国以往的政策方案着眼于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有效控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数量型作用机制有效实现了迅速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增长进入较高阶段,在趋向世界生产技术前沿的过程中,也需要调整相应政策,以更好地推动金融发展以质量型作用机制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动力层面上,需要推动动员型金融向资源配置型金融的转变;在能力层面上,需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表现为本土研发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及再创新的集成;在协调层面上,需要配套性体制与制度改革的支持,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与银行稳定性方面的改革,通过制度环境、商业环境与金融稳定性的提高,促进金融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在“一带一路”与新型工业化的建设中,以促进金融发展加速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CONTENTS | 目录

导 论	001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001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008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009
四、特点与不足	012
第一章 研究述评与方法论	014
第一节 金融发展内涵的界定与测度	015
一、金融发展内涵的界定	015
二、金融发展的测度	017
第二节 金融发展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026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起源	027
二、金融发展理论框架的进展	034
第三节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探索	037
一、显著性联系的文献综述	038
二、因果关系的文献综述	040
三、非线性关系的文献综述	041
第四节 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文献综述	045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功能观视角	045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传导渠道	045
第五节 国内研究的新进展	047
一、金融—增长因果关系	048